明弘治之后政权运作与诗文风气转向

刘 建 明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社科部, 浙江 杭州 311231)

[摘 要] 在我国文学思想传统中,有工具论与重自我感受、自我发抒、回归文学自身两条线。如果以正德朝为界将有明一代划分为两个时间段落,那么前期是工具论占主导地位,后期则是重自我感受、自我发抒、回归文学自身占主导地位,其中促成主导角色地位转换的因素固然是多层面的,如社会思潮变化、经济发展、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但若仅就政权运作层面来讲,除了有君主的行为导向外,手握重权当道官员的权力运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此为明代政权集团不同权力阶层共同运作的结果。

[关键词] 明代; 政权运作; 文学走向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4-0100-05

公元 1368 年,大明王朝定鼎南京。为守住已有战果,朱元璋对社会各个领域予以整肃,其中也涉及当时的诗文创作,要求以劝惩讽谏、明道教化、歌颂功德、粉饰太平为务,不得吟风弄月,对这类文体赋予了强烈的政治使命,否弃了其审美娱乐的功能。为将这种诗文观推上文坛主导地位,洪武至弘治年间的君主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强力抑制不合正统诗文观的创作倾向,为这一时段的诗文走向留出唯一通道,即只能按照正统诗文观规定的方向发展;以正统诗文观为标准引导朝臣创作;血腥清洗前朝旧臣,在肃清与正统诗文观相悖创作可能的同时,也为新人新文风的登台留出了空间;积极培植本朝新人,引领明代前期文坛的发展走向等等。在君主如此强力的干预之下,朱元璋确立的这种诗文观占据明代前期文坛主导地位达百年之久^[1]。一直到了正德朝,风向才开始转变,被新的文风所替代。

促成文坛主导文风发生转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思潮变化、经济发展、文学自身发展要求,等等,然而若就此一时段政权运作产生的较为直接的诱发作用而论,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主导文坛的诗文作家政治命运表现出了与此前的明显不同,不仅仕进缓慢,且绝大多数官位较低,如李梦阳为弘治七年(1494)进士,最高做过户部郎中,官至正五品;何景明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最高做过山西提学副使,官至正四品;唐顺之为嘉靖八年(1529)进士,最高做过右通政,官至正四品;袁宏道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最高做

过稽勋郎中,官至正五品;钟惺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最高做过南京礼部郎中,官至正五品。即使有个别作家官位较高,也都是任职于京师之外,如王慎中为嘉靖五年(1527)进士,官至从三品,任职河南参政;李攀龙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官至正三品,任职河南按察使;王世贞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正三品,任职南京大理卿。无论就官位来讲,还是就任职的地域而言,这些作家再也不能像此前的杨士奇、李东阳等人获取入内阁预机务的政治荣耀了,在政权运作的系统中,他们无权建议或决定政治走向,充其量只不过是政令的执行者而已。这些文士被隔离于政权运作中心之外,自然也就规避了严格的政治监督,在充分获取行为与思想自由的同时,政治责任感与使命感也变得淡薄了,为官更多的是出于生计考虑,对国家大政则失去热情,“一官因懒废,万事得禅逃。”^{[2] 83}

这是一批苦命的作家,政治命运多舛,多人遭遇打击,有的还不止一次。李梦阳科考及第任职的第二年,因权关得罪势要,“搆下狱”,虽不久获释,但在弘治十八年(1505),又以诬讪母后之罪名,再度下狱。获救之后,又在八虎用事之时,因起草奏章弹劾刘瑾,被刘瑾矫旨谪山西布政司,勒致仕。既而刘瑾复振他事下梦阳狱。刘瑾诛,梦阳起故官,在党争中,羁广信狱,后以陵辄同列,挟制上官之罪名,以冠带闲住去。宸濠造反被诛,御史周宣劾梦阳逆党,被逮。终因为宸濠作《阳春书院记》,被削籍^{[3] 7346-7348};何景明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正德年间,因弹劾刘瑾坐罢;康海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因救李梦阳与刘瑾有牵连,刘瑾败,海坐党,落职;王九思为弘治九年(1596)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不

[收稿日期] 2010-05-27

[基金项目] 2010 年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科研课题项目资助(编号: 2010YB09)。

[作者简介] 刘建明(1973-),男,河北阳原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久调吏部,至郎中,亦以谨党谪寿州同知,复被论,勒致仕;徐贞卿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孝宗遣中使问贞卿与华亭陆深名,深遂得馆选,而贞卿以貌寝不与,后被授大理寺左寺副,坐失囚,贬国子博士;王慎中,与夏言相忤,落其职。这些遭遇政治打击的文士开始困惑了:“丈夫有本性,安得不自保?”^{[4] 113}“灵鸟集君舍,君反见疑猜。忠信苟不显,杀身亦何为?”^{[4] 117-118}在责问声中,最后决定归去,“未蒙主人顾,何由效驰驱。”^{[5] 卷十一}“我当守蓬室,聊甘贱与贫。”^{[4] 92}传统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信念也由此而彻底坍塌。

其次,君主引导文风的导向发生转变,注重诗文的审美娱乐性,抛弃了洪武以来的正统诗美观。与文臣诗文唱和,亲近文臣,拉拢人心,巩固国家统治,这似乎是中国古代君主的一贯做法。正德皇帝虽然昏聩,多不遵祖制行事,但在与文臣诗文唱和方面,他并未特立独行,正德末年南巡之时,曾赋绝句十二首赐予辅臣杨一清^{[6] 31}。关于正德皇帝传世的作品所见甚少,很难窥知其作品的整体风貌,流传至今的似只有他巡幸宣府时作的一句小词:“野花偏有色,村酒醉人多。”^[7]从这一只言片语来看,审美娱乐特征明显。

嘉靖皇帝“每于万机之暇喜为诗”^{[6] 38},时常与群臣诗文唱和。嘉靖八年(1529)正月元夕,“臣道南应制撰《灯词》十五首以进。上亲制一章。”嘉靖九年(1530)七月,“敬一亭成,上复命儒臣落成锡宴进诗。”嘉靖十年(1531),“演马环碧殿,御制歌词赐同游,诸臣和之。”嘉靖十三年(1534),“臣自徽州赐环,上亲洒《钟粹宫词》命和之。”嘉靖帝还借诗问候生病、致仕的侍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载:“肃庙以礼部尚书席书病目,赐诗问之,期以弼亮。以刑部尚书赵鉴致仕,赐诗送之,嘉其止足。”^{[8] 卷十四}如果有人对他的这一喜好提出异议,自然会引来他的不满。当年张璠用事,“自愧不能诗,遂露章攻宏,谓其以小技希恩。”嘉靖皇帝“虽不诘责,而所圣制渐希矣。”^{[6] 38}嘉靖皇帝虽与文臣诗文唱和频繁,但从流传下来的资料来看,并未见其对正统诗美观的提倡,提倡诗文吟风弄月之用心倒是十分明显,如杨一清奉命拟赋上元诗进呈,“有‘爱看冰轮清似镜’之句,上以为似中秋,改云‘爱看金莲明似月’,一清疏谢,以为曲尽情景,不问而知为元宵矣。”^{[6] 38}

万历皇帝从小喜欢舞文弄墨,于慎行《穀山笔麈》载:“上初即位,好为大书,内使环立求书者,常数十纸;而外廷臣僚得受赐者,惟内阁讲臣数人而已。”“丙子殿读,张公位及慎行补入讲幄”,“上顾相君曰:‘新讲官二人尚未赐与大字。’”“内使已濡墨俟,上遂大书二副赐位及臣。”^[9]“大婚以后,留意文史篇什,遇元旦、端阳、冬至,必命词臣进对联及诗词之属,间出内帑所藏书画,令之题咏,或游宴即宣索进呈,至筵筵尤为隆重,筵赏之外,间有横赐,先人于同年及前辈诸公,无日不从事楮墨,而禁裔法馥,亦时时及门。”^{[6] 267}至于万历皇帝提倡的诗文创作倾向,《弇山堂别集》卷84载: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考生应弘志所作“策奇丽甚,而语多刺讥时政,且侵言官之横者,大臣惜而不敢显置之前,上忽拔之,中外惊异称服”^{[8] 卷八十四}。此外,明神宗喜好诗文的审美娱乐性,还可以从万历九年(1581)正月张居正所上的

一份奏疏中得到佐证:

伏睹皇上近日以来留神翰墨,|切嬉戏无益之事悉屏去不御。仰见圣学该洽,睿志清明,臣等不胜庆忭。夫人主|心,乃万化从出之原,亦众欲交攻之会。必使常有所系,然后纵欲之念不萌,而引诱之奸不入,故虽笔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关。而燕闲游息之时,藉以调适性情,收敛心态,比之珍奇玩好之属相去远甚,亦未必非进德养心之|助也。但臣等窃见前代好文之王,皆有文学之臣奉侍清燕,或丞诏等答、或应制赓酬,皆于语言文字之中微寓讽劝,箴规之益即今之翰林官是也。我朝廷置翰林,拔其英俊特异者除授此官,固储养德望以备居沃任枢机,然文史词翰、撰述讨论亦其本等职务,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日讲诸臣,皆文学优贍。见今记注起居逐在馆供事外,其余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臣等拟令轮番入直,每日轮四员,同日讲诸臣在馆祇候,皇上万机之暇,如批阅古文,欲有所采录或鉴赏、名笔欲有所题咏,即属诸臣,令撰具草稿,送臣等看定,进呈圣览,或不时召至御前面赐质问,令其发抒蕴抱,各见所长,以观其才品高下,他日量能擢用,自可断于圣衷^{[10] 2081-2083}。

张居正将神宗平日从事文事的行为视为“嬉戏无益之事”,规劝其多读“微寓风劝”之文,认为此当为君该做之事。

就实在情形而言,正德皇帝、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对诗文审美娱乐文风的提倡,是与这一时段的社会思潮变化、经济发展、文学自身发展要求相一致的。

最后,君、臣诗文唱和传统中断。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神宗不仅不与朝臣见面,而且对臣工的奏章一向是“留中不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万历朝结束。君、臣诗文唱和也由此而中断,沈德符说:“上朝讲渐稀,宸游亦简,至今日而警蹕不闻声,天庖不排,当岁时节序,亦未闻有一二文字进乙览,词臣日偃户高卧,或命酒高会而已。虽享清闲之福,而不蒙禁近之荣,似亦不如当时宠遇也。”^{[6] 267}神宗驾崩之后,长子朱长洛即位,是为泰昌帝,在位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匆匆谢世了。其子朱由校即位,因不喜欢读书,对诗文翰墨毫无兴趣,整日沉醉于木匠技艺当中,朝政事务全由宦侍魏忠贤代理,文臣难得见主一面,更毋庸说是与文臣诗文唱和了。朱由校未有子嗣,驾崩之后,弟弟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因其刚愎自用,不信任朝臣,内阁官员频频大换班,在十多年时间当中,先后有四十多人入阁,多数又都是在入阁几个月后匆匆离去。在这种情境之下,君臣诗文唱和的机缘着实难以形成。可以说,自万历中期之后君、臣诗文唱和传统中断,意味着文风走向失去了昔日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政治引导或约束,大大增强了诗文回归审美娱乐,回归文学本身的可能。

二

传统儒士的政治责任感与使命感一旦消失,那么国家作为寄托他们生命的主要载体也就不复存在了。按照中国传统士人儒、道互补的处世心理,在个人生命失去政治依托的情境之下,他们便会回归自我,关注个人人生,而此时的社会思潮变化、经济发展也为士人心态上发生的这种变化起了催化作用。士人心态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反映到诗文创作、理论上,则外化为从正德前政治教化角色转向抒情娱乐角色,而

弘治之后君主的上述行为导向所营造的政治氛围更使这种转化成为可能。

李梦阳认为诗的功能在于言志：“夫诗者，人之鉴者也。夫人动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声，声斯律。律和而应，声永而节。言弗睽志，发之以章而后诗生焉。”^{[5]卷五十一}与此同时，言与志必须要达到统一：“诗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气，平言者未必平调，冲言者未必冲思，隐言者未必隐情，谄情探调，研思察气，以是观心无度人矣。”^{[5]卷五十一}“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非宋儒废之也，文者自废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画焉，似而已矣。是故贤者不讳过，愚者不窃美。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德传志，其甚矣。”至于“志”的具体表现形态，李梦阳是这样说的：“夫诗言志，志有通塞，则悲欢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5]卷五十一}在他看来，“志”通则欢，“志”塞则悲，人的情感即为“志”的外在表现形态。至于诱发情感变化的原因，他做了这样的解释：“情者，动乎遇者也。幽岩寂深，深野旷林，百卉既瘁，乃有缟焉之英。媚枯缀疏，横斜锐崎，清浅之区，则何遇之不动矣。是故雪益之色动，色则雪，风阍之香动；香则风，日助之颜动；颜则日，云增之韵动；韵则云，月与之神动；神则月，故遇者，物也。动者，情也。”^{[5]卷五十一}他认为“情”决定于“遇”。如其《离愤五首》诗：

采采何边兰，鲤鱼何盘盘。念我同胞人，诀绝摧心肝。事变在须臾，浮云逝无端。临发路踟躇，谁敢前为言。原鸰抗高声，我行何时还。十步九回头，泪下如流泉。（之|）

北风号外野，五月知天寒。海水昼夜翻，南山石烂烂。丈夫轻赴死，妇女多忧患。中言吐不易，拊膺但长叹。永夜步中庭，北斗何阑干。裂我红罗裙，为君备晨餐。车动不可留，伫立泪洑澜。愿为云中翼，阻绝伤肺肝。（之三）^{[5]卷十一}

正德初年，刘瑾弄权，乖张用事。李梦阳为户部尚书韩文起草奏章弹劾刘瑾，因行事不周，被刘瑾得知，将他与韩文诬陷下狱，这组《离愤》诗即作于此一时期，“诀绝摧心肝”、“泪下如流泉”、“伫立泪洑澜”、“阻绝伤肺肝”，可谓将作者内心的绝望与伤痛真切的呈现了出来。

到了嘉靖前期，前七子逐渐偃旗息鼓，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迅速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对于诗的内容表达，李攀龙说：“夫诗，言志也，士有不得其志而言之者，俟知己于后也。”^{[11]卷十八}王世贞说：“夫诗，心之精神，发而声者也。”^{[12]卷六十五}“自昔人谓，言为心之声，而诗又其精者。予窃以诗而得其人，若靖节之言，澹雅而超诣；青莲之言，豪逸而自喜；少陵之言，宏奇而饶境；左司之言，幽冲而偏造；香山之言，浅率而尚达。是无论其张门户，树颀颀，以高下为境，然要自心而声之，即其人亦不必征之史，而十已得其八九矣。后之人好割写馀似，以苟猎一时之好，思蹇而格杂，无取于性情之真。”^{[12]卷六十九}通过“诗言志”实现“俟知己于后”与借助“性情之真”达到“以诗而得其人”，均在强调诗要表达作者真实的内心感受。王世贞的《悼亡儿果祥诗十首》之一、三：

得汝三年内，那能|日忘。谁知浪惊喜，翻为助悲伤。处处难开眼，时时总断肠。病夫骨髓尽，未数泪千行。

眉目真如画，聪明解读诗。见人为礼法，依母倍恩私。

事事俱堪系，声声未忍离。不眠仍起唤，星斗夜空垂^{[12]卷二十三}。

在儿子从出生到去世的岁月中，作者的情感经历了由大喜大悲的转变，回想起儿子生前的行为举止、音容笑貌，着实让人肝肠寸断，父子之间的骨肉情深在这两首诗中得到了真切展现。嘉靖年间，除了前、后七子外，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作为另一个文学流派，在当时的文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诗文的创作内容，唐顺之说：“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13]卷七}“直写胸臆”即是要求诗文要真实反映作者真实的内心世界。如其《山庄闲居》：

身名幸自谢笊樊，白首为农誓不谖。惯住山中知鹿性，数行树下识禽言。巾车每许邻翁借，书帙间同道士翻。醉后渐看松月上，满村鸡犬寂无喧^{[13]卷七}。

嘉靖年间，唐顺之得罪张璁而罢归，这首诗当作于罢归后闲居期间，从诗作的表面来看，是叙述一种慵懒闲适的乡村生活，但其中流淌出的却是作者怅惘与落寞的情怀。

与唐顺之相比，归有光对诗的功能的界定似乎更为明确，他在《沈次谷先生诗序》中说：“诗之道，岂易言哉？……夫诗者，出于情而已矣。”^{[14]卷二}他认为诗因情而成，是用来抒发情感的。如《途中悼内》：

默默忽自叹，独语谁能闻。思君在寥廓，长看天上云。行尽燕与齐，空然涕泪零。珊瑚问明月，照耀碧罗裙。昨夜还乡梦，清姿犹见君。（其二）

丈夫各有为，吾非儿女情。死生代所有，念子非世人。高山与流水，今世谁能听。自我久行役，何日无归心。每念复黯然，涕泪常满膺。有时静闭目，家乡路分明。月色照罗帷，小步尚盈盈。见我远还归，出门来相迎。（其三）^{[15]卷三十二}

这两首诗是作者为悼念亡妻而作的。不论是对妻子生前出门相迎细节的回忆，还是对妻子故去后内心凄苦悲凉感受的描述，均显得极为哀婉动人。

正德之后，文坛活跃异常，不同流派此起彼伏，“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随之”^{[3]7398}。“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3]7399}

袁宏道，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二十三年（1595）选为吴县令，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三十四年（1606）入京补仪曹主事，后被擢为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万历三十七年（1609）迁稽勋郎中。他在《叙小修诗》中说：

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传者，或今閻閻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鬻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

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酒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2]188}。

中郎论诗主情,主张诗文创作要“任性而发”。他甚为反感儒家的礼法说教:“形体作仆奴,礼法成枷钮”^{[2]366}。在他看来,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皆是诗文应该表现的内容,只有这些不受约束的情至之语,才是真诗。《病中短歌》即抒发了他的人生悲苦:

吁嗟我生年十九,头发未长颠已朽。病寒三月苦沉吟,面貌如烟戟露肘。羸枯博得妻儿怜,一尺浪为鬼神有。筐里残书别故人,几上龙钟关老叟。无情莫问囊中钱,有秫还充床下酒。虫臂鼠肝彼何人,嗟来了桑真吾友^{[2]9}。

中郎甚至还将做官视为束缚,将不得行乐的苦楚也写入了诗中:

白羽落青松,玄霜化秋草。燕市多冲飙,日暮红沙道。男儿生世间,行乐苦不早。如何囚官,万里枯怀抱。出门逢故人,共说朱颜老。眼蒿如帚长,闲愁堆不扫^{[2]99}。

即使在写给堂叔父的信中,他亦毫不掩饰这种不得行乐的愁苦情绪:

金阊自繁华,令自苦耳。何也?画船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异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观,非令观也。酒坛诗社,朱门紫陌,振衣莫釐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游客之乐,非令乐也。令所对者,鹤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虬虱满身之囚徒耳,然则苏何有于令,令何关于苏哉^{[2]211}?

基于这种“任性而发”的文学主张,中郎笔下的人物也极具生活化、个人化特征。如《拙效传》:

家有四钝仆:|名冬,|名东,|名威,|名奎。冬即余仆也。掀鼻削面,蓝睛虬须,色若锈铁。尝从余武昌,偶令过邻生处,归失道,往返数十回,见他仆过者,亦不问。时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见其凄凉四顾,如欲哭者,呼之,大喜过望。性嗜酒,|日家方煮醪,冬乞得|盖,适有他役,即忘之案上,为|婢子窃饮尽。煮酒者怜之,与酒如前。冬仆楼突间,为薪焰所着,|烘而过,须眉几火。家人大笑,仍与他酒|瓶,冬甚喜,挈瓶沸汤中,俟暖即饮,偶为汤所溅,失手堕瓶,竟不得|口,瞪目而出。尝令开门,门枢稍紧,极力|推,身随门闩,头触地,足过顶上,举家大笑。今年随至燕邸,与诸门隶嬉游半载,问其姓名,|无所知^{[2]724}。

通过对家仆迷途不问、见主大喜、为薪被烧、温酒堕瓶等细节描写,一个淳朴、憨厚、笨拙而又不失可爱的人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在中郎的写景作品中,生活化、个人化特征同样十分明显,如《满井游记》:

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望空阔,若脱笼之鹤。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靥面

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壘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2]681}。

冰皮始解的井水、积雪初融的山峦、将舒未舒的柳条、稀稀拉拉的游人、乍暖还寒的天气、悠然自得的飞鸟、游鱼,在展现一派生机盎然春天美景的同时,也折射出了作者清雅闲适的审美情调。

袁宏道的诗文创作主张得到了竟陵派的延续。谭元春在《王先生诗序》中说:“诗以道性情也”^{[16]卷九}。在此基础上,钟惺对如何才能“道性情”做了具体解释:“发而为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谓其事之所不可无,而必欲有言也。以为事之所不可无,而必欲有言者,声誉之言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性情之言也。”^{[17]275-276}他认为,诗必须应心而作,真实表达作者内心感受,不得为事而作,使诗沦为应酬事务的工具。钟氏的这一主张对朱元璋确立的正统诗文观是一种公然反对。如其《浣花谿记》

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沈瓜,窈然深碧,濛回城下者,皆浣花谿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后浣花有专名,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

行三西里,为青羊宫。谿时远时近,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谿,平望如莽,水木清华,神膚洞达。自宫以西,流汇而桥者三,相距各不半里。弁夫云通灌县,或所云“江从灌口来”是也^{[17]328}。

文中的景物描写,流露出的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生活情调,与正统诗文观所要求的标准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审美趣尚是明代后期小品文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复社与几社是明末两个影响较大的文学团体,复社领袖张溥死后,陈子龙事实上成为了两社的主帅。^[18]就诗的内容创作,陈子龙说:“诗者,寄托之情,不得已之志也。”^{[19]卷二}他认为情是诗抒写的根本。陈氏依据这一标准,对宋轶文诗作给予了很高评价:“今子之诗大而悼感世变,细而驰赏闺襟,莫不措思微茫,俛仰深至,其情真矣。”^{[19]卷二}陈子龙甚至以宋诗言理不言情而断言宋无诗:“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19]卷二}

概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传统中,诗文扮演政治教化与审美娱乐双重角色。如果以正德朝为界将有明一代划分为两个时间段落,那么前期是政治教化唱主角,后期则是审美娱乐唱主角,其中促成主导角色地位转换的因素固然是多层面的,但若仅就政权运作层面来讲,除了有君主的行为导向外,手握重权当道官员的权力运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此为明代政权集团不同权力阶层共同运作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刘建明.明代前期政权运作与诗文走向[J].社会科学辑刊,2009(4):138-140
- [2] 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1.
- [3]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 何景明. 何大复集[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 [5] 李梦阳. 空同集[M]. 明嘉靖刻本.
- [6]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7]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 4
- [8]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9] 于慎行. 穀山笔麈(卷2)[M]. 明万历于纬刻本.
- [10] 明神宗实录[M]. 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 [11] 李攀龙. 沧溟集[M]. 台北: 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
- [12] 王世贞. 弇州山人四部稿[M]. 台北: 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
- [13] 唐顺之. 新刊荆川先生文集[M]. 四部丛刊景明本.
- [14] 归有光. 新刻震川先生全集[M]. 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 [15] 归有光. 归先生文集[M]. 明万历四年雨金堂刻本.
- [16] 谭元春. 谭友夏合集(卷9)[M]. 明崇祯六年刻本.
- [17] 钟惺. 隐秀轩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8]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4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181.
- [19] 陈子龙. 安雅堂稿[M]. 明末刻本.

The Ope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of the Court Impacted on the Trends of Literature after Hongzhi of Ming Dynasty

LIU Jian-ming

(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 Hangzhou 3112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literature enacts the parts of tool and giving vent to one's feelings. Before Zhengde dynasty, the tool attribute reigns over literature realm. After this, giving vent to one's feelings does. This change is caused by many factors, and the ope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of the court is one of them, which contains actions of emperors and official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the ope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of the court; the trends of literature